

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
汉外语言文化对比课题组

张起旺
王顺洪
主编

汉外语言 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

hanwai yuyan duibi yu pianwu fenxi lunwen ji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

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
汉外语言文化对比课题组

张起旺 王顺洪 主编

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/张起旺,王顺洪主编.北京:
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9.5

ISBN 7-301-03830-5

I. 汉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III. 汉语-对比研究-外语-文集
IV. H0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0003 号

书 名: 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

著作责任者: 张起旺 王顺洪 主编

责任编辑: 王纯清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3830-5/H·0411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/cbs.htm>

电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8

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排版者: 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625 印张 22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14.00 元

前 言

汉外语言对比、汉语偏误分析、中介语理论,是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吕叔湘先生和王还先生指出,只有通过汉外语言对比研究,才能发现汉语的特点,才能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预见性,减少或避免学生母语的干扰。偏误分析与对比分析相辅相成,偏误分析是对比分析的深化和发展。盛炎和沙砾先生明确将偏误分析称为第二应用语言研究的前沿阵地。中介语理论为对比分析、偏误分析提供了理论指导;对比分析、偏误分析是中介语理论的基础。对比分析、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,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:揭示第二语言的习得规律。

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汉外语言文化对比课题组于1995年成立,主要目的就是加强汉外语言对比、偏误分析以及中介语等的研究,努力探索和揭示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的规律。课题组成立短短三年来,各位教师在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工作的同时,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。本集所收的论文,除个别篇目是外单位同行的来稿外,均为本课题组成员所撰。论文的内容,以汉日对比研究和偏误分析居多,也涉及到汉英语言对比、汉韩语言对比、跨文化交际等。从整体来看,拓展的层面似乎还不够广阔,深度的开掘亦需进一步努力,中介语研究方面尤其是薄弱环节。然而,论文集毕竟反映了课题组初步的劳动成果,是集体心血的结晶。这些论文有一个突出特点,那就是,建立在丰富的教学实践基础之上,力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。正因如此,每篇都不乏真知灼见,对于人们认识外国人习得汉语的规律,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预见性和针对性,会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。至于其中的不妥之处,

诚望批评指正。

国家汉办的资助和北大出版社的支持,给了我们一个展示研究成果的机会,在此谨致谢忱。

编 者

1998 年 6 月

目 录

中日汉字异同及其对日本人学习汉语之影响·····	王顺洪(1)
汉日同形词给日本人学习汉语造成的误区·····	王顺洪(17)
汉日叹词比较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·····	刘元满(25)
从汉语日语吸收外来语的情况看中日两国	
交流·····	刘元满(37)
汉英量词对比·····	钱旭菁(53)
韩国语汉字词汇与汉语词汇的比较·····	韩信子(66)
关于汉语偏误分析·····	张起旺(76)
语言教学中的积极性偏误和消极性偏误	
——以中高级班留学生汉语词汇学习为例·····	祖人植(83)
外国留学生的汉语篇章偏误分析·····	林 欢(99)
外国留学生汉语离合词偏误分析·····	任雪梅(116)
日本学生“一点儿”“有点儿”偏误分析·····	任雪梅(128)
日本学生汉语介词偏误分析·····	张起旺(136)
日本留学生汉语趋向补语偏误分析·····	钱旭菁(149)
日本留学生汉语副词“也”偏误分析·····	黄立、钱旭菁(165)
从日本学生的偏误谈汉语的指示代词·····	王 硕(176)
日本人学习汉语的优势、劣势及改进对日	
本留学生汉语教学之构想·····	王顺洪、赵明德(183)
从复句形成过程及偏误等角度看副词的	
篇章功能·····	杨德峰(199)
也谈修辞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·····	杨德峰(211)

社会主义背景与跨文化交际误读 赵延风、袁冰(221)

汉日语言之文化附加意义的几种类型..... 吕俞辉(237)

附录:汉外语言对比、偏误分析、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

参考文献(1977—1998)..... 钱旭菁编(245)

中日汉字异同及其对 日本人学习汉语之影响^①

王顺洪

古代在亚洲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文化圈,一个是以印度佛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,一个是以中国儒学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。这两个文化圈既互相独立又互相渗透,其所创造的东方文化,在人类文明史上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辉,至今仍对亚洲乃至世界发生着深刻影响。古代中国、日本、朝鲜、越南,是东亚文化圈的主要国家,儒家文化的载体和工具——汉字,曾长期为这些国家所共同利用。然而,自近代以来,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,打破了儒学在东亚文化圈的统治地位,汉字开始面临着衰退的命运,先后有越南和朝鲜半岛废弃汉字(韩国仅保留了少量汉字),改用拼音文字。不过,日本却基本保留了汉字在本国文字中的地位,中日两国语言本来语系不同,但是,汉字这一媒介,把两国的历史、语言、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中文和日文均使用汉字,很容易使西方人产生“同文”的感觉,东方人亦常常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。实际上,两国的汉字不同的地方很多,二者表面相同,实际不同,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。那么,中日汉字究竟是怎样的关系?它们到底有哪些异同?尤其是对日本人学汉语有何影响?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媒体,加强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?搞清这些问题,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中日汉字之源与流

1.1 中国汉字的诞生及其向日本的东传

中国是汉字的故乡，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，其间，经历了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、草书、行书等字体的演变。秦统一中国，先是以小篆，最后以隶书实现了中国文字的统一和定型化，标志着汉字脱离古文字阶段，进入了成熟时期。

汉字成熟不久，就走出故乡到了日本。据中国史籍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：“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，光武赐以印绶。”1784年，日本福岡县志贺岛海边出土了一块金印，上边写着“汉委奴国王”几个字。有人推测，那就是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中国汉光武帝赐给倭国王的金印，1962年，在日本奈良县的一座古坟内，出土了一把环形大刀，刀上刻着“中平〇〇年五月丙年，造作文刃，百练清刚，上应星宿，不辟不〇”二十四个汉字。据考证，该刀是中国后汉灵帝时代，即日本中平元年到七年间（公元184~190年）铸造的。1951年，大阪府和泉市的一座古坟内出土了一面神兽镜，上边的铭文也是用汉字刻写的：“景初三年，陈是作铭，铭之，保子宜孙”，景初三年即公元239年。中国的《三国志·魏书·东夷传》里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景初二年六月，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，求诣天子朝献，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。”^①倭女王特使回日本时，魏明帝曾回赠金印和铜镜。有人认为，大阪和泉市出土的刻着“景初三年”的神兽镜，就是魏明帝回赠倭女王的那面铜镜。诸如此类的出土文物证明，汉字于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间就已传入日本。

除了考古文物作证外，中日两国还有许多文字记录。据日本最早的历史文献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记载，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，即公元285年，天皇曾招百济（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一）王仁到日本，教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汉文，王仁把《论语》带到了日本。据考察，那是最早从中国输入到日本的汉籍，也是汉字大量传入日本的初始。在中国《宋书·列传·夷蛮》中，有一份倭国派使臣向中国南朝宋朝递交的国书，完全是用汉文写的，与中国古文几乎没有

区别,有人推测是汉归化人写的,时记乃“宋顺帝升明二年”,即公元 478 年。这表明当时日本不但已使用汉字,而且宫廷内很需要并已有人写出很好的汉文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,公元 604 年日本圣德太子公布的治国纲领《十七条宪法》,公元 712 年、720 年问世的《古事记》、《日本书纪》,竟全部是用汉文写的,说明汉字汉文在当时的日本是何等流行!

上述考古文物与文献记载,虽有的地方尚须进一步考证,但中国汉字至少于公元三世纪以前就传到了日本,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那时候,日本虽有本民族语言,却没有本民族文字,因而,中国汉字传到日本后,马上就为宫廷所采用,随后便在全社会流行开来,在日本列岛扎下了根。

1.2 汉字在日本文字形成中的地位与作用

日本完全借用汉字汉文,只不过是暂时的过渡现象。日语是粘着语,汉语是孤立语,二者语系根本不同,汉字汉文不可能被长久用来填补日本没有文字的空白。然而,日本的民族文字正是在汉字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,汉字不但成了孕育日本文字的胚胎,而且成了日本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日本的文字从无到有,大体经过了从完全使用汉字汉文到用汉字标记日语发音,又从用汉字标音到将汉字与假名混合使用三个阶段。

如果说公元 604 年圣德太子颁布的《十七条宪法》尚属于比较标准的中国古文,那么,到了公元 712 年问世的《古事记》,实际上与中国古文已有区别,虽使用的还都是汉字,但许多句子已具有日语特点。比如,《古事记》中有这样一句:“宇都志伎青人草。”其中的“宇都志伎”四字,仅仅是标记日语的发音,与汉字本身的含义已没有关系,而“青人草”仍具有汉字的含义。《古事记》中出现的这种借汉字时而表音,时而表意,混杂使用的情况,发展到八世纪末问世的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《万叶集》,汉字已失去了原有的含义,变成了单纯的日语标音符号。《万叶集》的诗句,尽管全部是用汉

字写的,但语言结构、表达方式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汉文,变成了纯粹的日本文体。其中有一首和歌这样写道:“三轮山乎,然毛隐贺,云谷裳,情有南敏,可苦佐布倍思哉。”全诗的汉字几乎都是用来标记日语的发音,像“然毛隐贺”、“可苦佐布倍思哉”,若按汉字原义解释,纯属风马牛不相及。日本正是从这部《万叶集》开始,正式全面地采用了借汉字标记日语发音的方法,当时,日本将那些作标音符号的汉字称为“万叶假名”,又称“真名”,它是日本民族文字诞生的前奏。

到了日本平安朝初期,即八世纪末、九世纪初,日本人越来越感到汉字笔画太繁,用来标音很不方便。于是,由在中国学习过多年的遣唐使吉备真备和名僧空海,在“万叶假名”的基础上,分别取汉字楷书的笔画创造了片假名,取汉字草书的笔画创造了平假名,用该种新的符号替代汉字标记日语的发音。例如:阿→ア、伊→イ、宇→ウ、奈→ナ、保→ホ、安→あ、以→い、字→う、奈→な、保→ほ。总共创造了五十个表音字母——假名,每个音都有平假名、片假名两种书写方法。表音字母“假名”的出现,解决了“万叶假名”的不便,在日本的文字史上终于完成了一次实质性的飞跃。

表音字母平假名、片假名发明以后,日本虽不再用汉字标音,但并没有否定、抛弃汉字。他们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优点,在书写时,词干一般用汉字表意,词尾和助词用假名表音,按日语语法把它们组合排列起来,从而形成了汉字与假名混合、表意与表音同用的新的文字体系。同时,日本汉字一般都有两种读法,一种是从汉语脱胎而来的发音,叫做音读,一种是日本固有的发音,叫做训读。这一系列的创造及其定型化,明确标志着中国汉字已被日语融合、吸收,成了记录日语的书面符号体系,标志着日本民族的文字终于诞生了。而这一过程的启动与完成,若没有中国汉字的传入,简直是不可想像的,因而,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没有中国的汉字,也就没有日本的文字。

1.3 中国的文字改革与日本的汉字精简

中国汉字自秦汉时期走向成熟后,除了数量有所增加,书写风格有新的创造,更具艺术魅力外,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,笔画结构一直比较稳定。直到公元十九世纪后期,由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传入和影响,中国才开始有人明确提出汉字认、读、写不够方便,倡导文字改革运动。

最早主张文字改革的是清代末期的文字学者王照等人。1900年,王照出版了《官话合声字母》一书,取汉字有关部首发明了62个表音字母。1918年,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把1913年读音统一会用作讨论的记音字母“ㄅ、ㄆ、ㄇ、ㄌ、ㄋ、ㄍ、ㄒ、ㄑ”等40个符号作为注音字母公布。1930年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注音字母修定为37个,并开始编纂出版《国语辞典》,在全国推广。

中国在推广注音符号的同时,还推广了拉丁字母表音方式。1928年,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》。1931年,中国新文字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召开,1935年,由陶行知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,拉丁新文字运动在中国蓬勃展开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1954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,1956年,决定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,1958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

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,曾有人主张以拉丁字母汉语拼音代替汉字。但是,中国各地汉语发音复杂,不可能行得通。为此,人们普遍认为,除了统一汉字的拼音方法外,中国文字改革最现实的内容应该是简化汉字。汉字是世界上数量最多,笔画最繁复的文字,《康熙字典》字数多达47035个,连一般人通常用的《新华字典》,收字也达8000多个,并且,在常用汉字中仍有许多字笔画繁复,从而增加了人们学习、使用汉字的困难。

汉字的简化问题,早在1909年就由陆费逵等学者提出了。1935年,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了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,但

很快搁浅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加强了汉字简化工作。1955年,公布了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,精简了一千多个异体字。1956年初,国务院公布了《汉字简化方案》,1964年,公布了经过整理的《简化字总表》,其中包括不作偏旁的简化字352个、可作偏旁的简化字132个、简化偏旁14个、类推简化字1753个。部分汉字经过简化以后,既保持了汉字特有的完整性与美感,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笔画过繁的现象,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学习、使用,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汉字改革。在改革过程中,曾有人主张废弃汉字,全部采用假名或罗马字,把日文变成纯拼音文字。但多数人认为,汉字的表意和造语功能很强,在日文中具有特殊作用,废除汉字将给日本文字文化带来混乱。例如,日语“庭には二羽鶏がいる”(院子里有两只鸡)这个句子,因其中有汉字,意思可一目了然,若取消汉字,就变成了“にわにはにわにわとりがいる”,很难使人马上明白本来的意思是什么。但是,人们也普遍认为,汉字确实存在着诸多不便,应该在数量上加以限制。为了减轻学习、使用汉字的困难,明治初期把小学国语课本的汉字数量减缩到1862个。1902年,日本文部省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,专门研究汉字问题,1931年规定常用汉字为1858个。1935年文部省设立国语审议会,1942年底公布《标准汉字表》,把在小学阶段学习的汉字扩大到2669个。1946年,国语审议会新制作了《当用汉字表》,将常用汉字压缩到1850个字,并于1948年从中选出881个作为“教育汉字”,供小学生学习,1971年将“教育汉字”增加到996个。1981年,日本政府重新公布《常用汉字表》,收入汉字1945个。总之,日本汉字改革的重点是控制使用汉字的数量,规定的数量时增时减,但基本未超过2000个。

日本除了控制汉字使用的数量外,也对某些笔画复杂的汉字进行了简化。1908年,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的《汉字要览》,

对 72 个繁体字进行了简化。那是日本最早正式采用的简化字,称为“别体字”。1946 年,在新公布的《当用汉字表》中,简化字增加到 131 个。1949 年,文部省再次公布《当用汉字字体表》,按照统一异体字,使用简化字,减少、合并点与画,印刷体与笔写体相统一的四条原则,从 1850 个常用汉字中确定出 300 个字,进行了统一的简化。日本汉字的简化方法,大多数与中国相一致,也有少数不一致,但简化字的数量比中国少多了。

从追溯中日汉字的源与流我们清楚地看到:汉字源于中国,流入日本,曾填补过日本文字的空白,后来孕育了日本的文字,但仍然是日本文字的组成部分。近代以来,中日两国均进行了汉字改革,在使用汉字的数量和汉字简化方面出现了差别。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,中日两国汉字分别用于标记不同语系的语言,存在着种种差异,不过,相同的方面毕竟还不少,汉字依然是沟通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与关系的天然纽带,是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的共同财富。

二、中日汉字之同与异

中日两国汉字特殊的渊源关系,决定了它们之间息息相通,有大量共同点。两国语言体系的完全不同,汉字在两个不同国家所经历的变迁,又造成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。中日两国汉字的异同主要有哪些呢?我们依据中国的《新华字典》和日本的《常用汉字表》,试从形、音、义三个方面加以比较。

2.1 字形方面的同与异

(A) 笔画完全相同。定型以后长期处于比较稳定状态的中国汉字,传入日本以后仍保持了这种特性。纳入日语体系后的中国汉字,虽大多数读音、意思发生了变化,但字形、笔画并未怎么变化,或仅发生了小的变化。1981 年日本公布《常用汉字表》,共收入汉字 1945 个,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保持了原来中国汉字的笔画,至今仍为中日两国所共同使用。例如: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南、西、北、

春、夏、秋、冬、白、黄、父、母、夫、妻、子、女、男、区、民、老、少、天、地、湖、山、石、厚、短、近、年、月、日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雨、雪、酒、茶、哀、喜、打、流、会、同、事、新、古、防、遍、慌、眠、理、急、舞、歌、静、城、推、持、取、想、潜、熟、籍、藉等等。如果连中国的繁体字也算在内,两国笔画相同的汉字就更多了。

(B) 笔画略有不同。这些汉字本来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,后来,在日本人使用过程中形体发生了变化,或简化方法与中国有所不同,其变化往往仅是一笔一画或笔画长短之差。这类汉字数量不太大,仅占日本常用汉字的百分之五左右。例如:与一与、边一辺、荣一栄、劳一劳、单一单、画一画、团一团、厅一庁、压一圧、收一収、灰一灰、茎一茎、吴一呉、具一具、别一別、赞一賛、齐一斉、决一決、对一对、带一带、藏一蔵、惠一恵、变一变、差一差、浅一浅、海一海、两一両、践一踐、舍一舍、称一称、寿一寿、黑一黒、营一営、德一徳等等。此外,日本使用的汉字基本都是繁体字,许多字在中国已被简化了,比如部首“讠”、“讠”、“马”、“乡”、“车”、“韦”、“贝”、“见”、“风”、“钅”、“鸟”、“页”等,而日本仍在沿用繁体,这方面的差异最为普遍。

(C) 笔画差别较大。这里包含两种情况,一种是中日两国简化方法很不一样的汉字,另一种是日本自造或中国已停用的简俗字。日本虽与中国一样进行过汉字简化工作,但简化字的数量比中国少得多。有的日本学者曾主张中日协同研究汉字简化的问题,把两国的简化字统一起来,但是,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实现。因此,两国在一些汉字的简化方法上出现了差异。据统计,在中日两国 233 对简化汉字中,笔画相同的有 67 对,大同小异的有 52 对,而差异比较大的达 114 对,几乎占了一半。例如:元一円、广一広、气一気、验一験、齿一歯、释一釈、摄一摂、读一読、传一伝、卖一売、实一実、发一発、佛一仏、辨一弁、龙一竜、鸡一鶏、垒一塁、艺一芸、县一県、价一価、樱一桜、围一囲、泽一沢等等。除了简化

方法差别较大外,还有一些日本汉字,是日本自造的“国字”,或中国已停用的简俗字,中国人根本不认识。例如:𩇑、辻、𣎵、畑、𪔐、畠、掙、櫛、𪔐、𪔐等。

2.2 字音方面的同与异

中国汉字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字后,读音方面的变化要比字形方面的变化大得多。首先,中国汉字是一字一音节,进入日语后多数变成了一字多音节。其次,中国汉字有四声变化,日本汉字没有声调变化。另外,也是最复杂的一点,中国汉字一字多音的比较少,即使有也多不过两三个读音。而日本汉字呢?一个字至少有音读与训读两种读音,一个字三、四种读音的情况也比较普遍,甚至有的汉字读音多达七八种、一二十种。将中日汉字的读音相对照,可发现有三种情况(为便于比较,汉语用汉语拼音,日语用罗马字母标音):

(A) 读音相似。日本汉字的所谓音读,实际上就是指由中国的汉音、吴音等演变而来的读音。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,绝大多数中国汉字的读音,进入日本之后发生了变异,但仍有少数汉字保持了与中国汉字相似的发音,甚至有的除了音调不同外,几乎达到了中日“同音”的地步。例如:哀(āi)—哀(ai)、空(kōng)—空(kū)、麻(má)—麻(ma)、小(xiǎo)—小(shō)、油(yóu)—油(yu)、天(tiān)—天(ten)、新(xīn)—新(shin)、以(yǐ)—以(i)、衣(yī)—衣(i)、要(yào)—要(yō)、有(yǒu)—有(yū)、因(yīn)—因(in)、苦(kǔ)—苦(ku)、他(tā)—他(ta)、内(nèi)—内(nai)、度(dù)—度(do)、胆(dǎn)—胆(tan)、夫(fū)—夫(fu)、父(fù)—父(fu)、道(dào)—道(do)、南(nān)—南(nan)、分(fēn)—分(fun)、满(mǎn)—满(man)、民(mǐn)—民(min)、毛(máo)—毛(mō)、利(lì)—利(ri)、老(lǎo)—老(lō)、可(kě)—可(ka)、科(kē)—科(ka)、歌(gē)—歌(ka)、始(shǐ)—始(shi)、社(shè)—社(sha)、知(zhī)—知(chi)、临(lín)—临(lin)、在(zài)—在(zai)等等。这些汉字的发

音,多数仅是有无声调的区别。

(B) 读音接近。日语汉字的音读,除了一小部分与中国汉字的读音相似外,绝大部分是属于与汉语的读音比较接近,虽听起来不太一样,但能使人明显感到是受了汉语读音的影响,与汉语读音具有某种程度的“共鸣”。例如:春(chūn)—春(shun)、秋(qiū)—秋(shu)、商(shāng)—商(shō)、字(zì)—字(jì)、年(nián)—年(nen)、海(hǎi)—海(kai)、加(jiā)—加(ka)、神(shén)—神(shin)、方(fāng)—方(hō)、金(jīn)—金(kin)、球(qiú)—球(kiu)、区(qū)—区(ku)、草(cǎo)—草(sō)、高(gāo)—高(kō)、差(chà)—差(sa)、再(zài)—再(sai)、性(xìng)—性(sei)、定(dìng)—定(tei)、深(shēn)—深(shin)、费(fèi)—费(hi)、连(lián)—连(ren)、夜(yè)—夜(ya),等等。

(C) 读音大异。这主要指的是日本汉字的训读,它是日本独有的读音,与汉语原来的读音没有关系。例如:青(ao)、赤(aka)、紫(murasaki)、绿(midori)、上(ue)、下(shita)、足(ashi)、朝(asa)、泉(izumi)、话(hanashi)、顶(itadaki)、牛(ushi)、犬(inu)、猫(neko)、江(e)、海(umi)、役(yaku)、丘(oka)、冲(oki)、弟(otōto)、兄(ani)、颜(kao)、形(katachi)、君(kimi)、菊(kiku)、岸(kishi)、草(kusa)、口(kuchi)、首(kubi)、组(kumi)、毛(ke)、水(kōri)、先(saki)、酒(sake)、里(sato)、旅(tabi)、力(chikara)、父(chichi)、波(nami)、冬(fuyu)、操(misao)、水(mizu)、桃(momo)、山(yama)、雪(yuki)、川(kawa)、嫁(yome)等等。

2.3 字义上的同与异

中日两国的汉字,若仅从单个字的含义看,绝大多数一致,无明显区别,前边列举的许多汉字即如此。可是,一组成合成词情况就复杂了,因此,本节实际是谈合成词的同与异。由两国相同或相似汉字组成的合成词,大致可以分为同形同义、异形同义、同形异义三种情况: